

<<共和国部长访谈录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共和国部长访谈录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33048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33046

出版时间：2009-10

出版时间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：马国川

页数：35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共和国部长访谈录>>

内容概要

“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。

”当我们回首共和国六十年历史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深沉的历史沧桑之感。

反映这个国家的奋斗历程，我们既需要史诗般的宏大叙事，也需要个人的娓娓述说，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，不只是若干概念的静态勾勒，更应是一个个鲜活的公民个人记忆的汇集。

<<共和国部长访谈录>>

作者简介

马国川，《经济观察报》高级记者。

已出版《大碰撞：2004—2006中国改革纪事》、《争锋：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》、《观察：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》、《风姿兼程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》等，其中《大碰撞：2004-2006中国改革纪事》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，被评为“2006年十大好书”之一。

<<共和国部长访谈录>>

书籍目录

杜润生访谈录 愿做农民的代言人钱正英访谈录 水利选择了我 我选择了水利何康访谈录 我是代表八亿农民领奖的蔡诚访谈录 司法部长的人生路宋木文访谈录 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高尚全访谈录 见证改革历程彭珮云访谈录 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之路傅志寰访谈录 铁道部长的光荣与梦想项怀诚访谈录 改革是六十年财政的主线张保庆访谈录 我们一直在努力

<<共和国部长访谈录>>

章节摘录

杜润生访谈录 愿做农民的代言人 土地改革的得与失 马国川：您1913年出生，是个世纪老人，一生经历了众多的历史事件。

杜润生：我从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，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，确实经历了太多的历史事件，其中许多是关系到改善农民经济政治地位的事情。

最早可以从土改算起。

马国川：土改开始时，您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秘书长、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。

杜润生：1950年初，中央决定召开全会，土地问题是议程之一。

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，我两次被召到北京，列席了中央准备通过《土改法》的会议。

会前毛泽东还找了部分新解放区的干部了解情况，我介绍了中南局讨论过的土改要分阶段：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、减租减息，主要是摧毁反动政权。

第二阶段是建立政权，先建立农会，再分配土地。

毛泽东说，这个安排很好，他还让我们回去写个报告。

后来毛泽东对该报告作了批示，并以中央名义发出。

以后我们又提出，土改应分为三个阶段，增加了土改复查与组织建设阶段，对此毛又批示说：“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很必要的，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，不要省略和跳跃。

”马国川：《土改法》是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，从此土改有法可依了。

杜润生：那次会议是毛泽东主持的，记得当时有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注意教育农民节约，分田后大吃大喝不好，应该防止。

毛泽东插话：“千年受苦，一旦翻身，高兴之余，吃喝一次，在所难免，此后注意就是了。”

此话既讲理、又讲情，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刘少奇在会上作了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》。

新的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报告，把过去好的经验都肯定下来了。

确定了土改应该依照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方针、政策和步骤，有领导、有计划、有秩序地进行。

在政策方面也应按新民主主义的战略方针，保留富农，保存私人工商业，保护中农。

还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，允许各地对民主革命程序自行决策。

特别对于西藏，允许1957年以前不搞民主改革，对内蒙古也实行特殊政策。

会议传达下去，全党一致表示拥护。

马国川：那么在执行过程中主要有什么问题？

杜润生：各地方在运动中特别是在运动高潮中，总是面临一个难题：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和正确执行政策这两个方面如何协调？

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？

从抗日初期到解放前，几个阶段都是反“左”出右，反右出“左”，来回反复，一直延续到解放后。

比如在富农问题上，《土改法》明确规定“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，不得侵犯”，毛泽东也说过，“富农放哨，中农睡觉”，保存富农有利于刺激中农的生产积极性。

但是，中央全会却又同意个别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处理这一问题。

结果，中南、西南两大区全部消灭了富农经济。

这种做法是有缺陷的。

如果说今天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还有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，那么，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就需要重新评价了。

事实上，在华东地区一些地方，实行“中立富农”的政策，土改的阻力就小一些，富裕中农也比较安心。

马国川：土地改革是中共农村革命之始，到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，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。但是对于土改的意义，现在仍有不少误解。

<<共和国部长访谈录>>

在您看来，土改的意义是什么？

杜润生：土地改革的意义特别重大，一直影响到当初的“合作化”和今日的“包产到户”，绝不能简单地贬之为“历史的陈迹”。

有人说包产到户是“辛辛苦苦三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”，这是不对的，它只是回到了土地改革。关于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，以往人们认识的并不充分，我特别强调了国家通过土地改革，重组了基层，使上层和下层、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，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。人们以为旧中国是“政权不下县”，因此打通基层，意义尤为重大，是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步骤。

马国川：但是有些人，包括一些国外学者认为，中国土改“反封建”没有必要，因为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，已没有封建制。

杜润生：确实，那种典型的土地封建领主制，农民依附于土地的庄园经营形式，在中国早已不存在了。

但因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，官僚军阀强权掠夺、无偿占有，却到处可见。特别是民以来，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，官府横征暴敛，超经济掠夺，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转嫁于农民，加上人口增加，生活艰难，地租率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。

大部分地区，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，当时依然存在。

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。

鸦片战争后，帝国主义入侵，掠夺资源，曾刺激农产品、矿产品加工业的发展，资本主义因素开始出现，但其主导部分，更多属于买办资本，其经营手段多系掠夺性质。

可见，当时的中国经济结构，虽具有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征，称之为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，是比较准确的。

这个社会结构，除非采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，没有别的出路。

马国川：也有学者根据一些历史资料（包括地主收租簿在内），认为在不少地方，地主收租一般只能收到七八成的样子；田主若想收田另佃，也往往难以实现。

换句话说，地主的所有权是残缺的。

而且土改对经济发展的好处，一些人也持怀疑态度。

杜润生：这种调查，是否具有广泛代表性，尚属疑问。

近代中国的历史天灾战祸频频发生，地租既高，收租又难。

但不能由此得出“有地主无剥削”的结论，也不能否认土地改革的合理性。

至于土改对经济发展的好处，这在当初就是有争议的。

在苏区一些地方，分田后的最初几年，生产往往是下降的，这与战争环境有关。

全国解放以后，有几年生产发展（或曰“恢复”）是很快的。

但这一过程太短，很快就进入另一项制度变革，土改所激发的生产者积极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现。

综观农村变革、家庭承包制的实行，在农业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，是否也可以证明土地改革的合理性！

马国川：在您看来，当年土地改革是否存在问题？

主要是哪些问题？

杜润生：当然，当年土地改革的某些做法是有问题的。

这也毋庸回避。

例如，土地改革是一场大革命，是对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，它没有严格地依法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，留下了不利影响。

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。

影响所及，今日实行市场经济，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。

在土改中，剥夺地主垄断权是合法的，可是“打乱平分”就有负面影响，侵犯了中农利益。

土改后实行合作化期间，合作占有和财产归大队，两者之间政策界线划分不够严格。

后来在实行家庭承包制中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缺乏法律保障，村干部任意调整地权事件层出不穷，违背中央关于土地使用权三十年不变的政策。

<<共和国部长访谈录>>

今后如果不能走上法治轨道，就无法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

以法治取代人治，乃是时不可待的事情。

农业合作化运动 马国川：1952年11月，中央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后，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。

邓子恢任部长，陈伯达、廖鲁言任副部长，您担任秘书长，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。

杜润生：我和邓子恢是1953年1月从中共中央中南局上调北京。

一天邓子恢约我一起去见毛泽东，向他报到。

毛泽东说，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，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，主要的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。

他还说，我们不是说过上、下两篇文章，上篇搞民主革命，下篇搞社会主义嘛！

就农村说，土改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了。

我们计划在十至二十年之内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，改造小农经济。

马国川：在1949年政协会议上，有人主张《共同纲领》写上社会主义目标，中央不赞成。

当时毛泽东解释说，搞社会主义，是在二十年，甚至三十年以后，要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，要在人民群众都表示同意以后，然后从容地、不勉强地发起全面的社会主义进攻，消灭资本主义。

但是，现在毛讲的上述决定和原来的想法不大一样，马上要搞下一篇文章了。

杜润生：当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建设阶段，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、新民主主义政治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。

在这个时期承认个体经济长期存在，还要保留富农，保留资产阶级。

下一步社会主义大革命大约是在十至二十年以后，而不是在这个时段之内。

所以，在回机关的汽车上，邓老对我说：看来合作化问题，中央已经确定大方向了，我们不好再说什么。

但是十五年还长，有的是时间，我们可以在细节方面，即在步骤和政策策略上多用心，多替中央操心。

邓子恢之所以说“不好再说什么”，大概就是指此而言。

其实，在我们上任之前，1951年就发生了一场关于农村合作化的争论。

.....

<<共和国部长访谈录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